

CSSCI來源集刊

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

編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三十八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

編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三十八輯)

Journal of the 3-9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三十八輯 / 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325-9084-1

I. ①魏… II. ①武… III. ①史評—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②史評—中國—隋唐時代 IV. ①K235.07
②K241.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9)第 020281 號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八輯)

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啓東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7.75 插頁 2 字數 316,000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084-1

K·2593 定價: 8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本輯得到

武漢大學基礎學科振興行動計劃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武漢大學自主科研項目

資助出版

主編：凍國棟

編委：（以拼音字母爲序）

陳明光	凍國棟	關尾史郎	郝春文	何德章
侯旭東	胡寶國	黃正建	劉安志	陸揚
羅新	妹尾達彦	孟彥弘	牟發松	氣賀澤保規
榮新江	辻正博	孫繼民	王承文	王素
魏斌	閻步克	張國剛	張榮強	佐川英治

執行編輯：朱海

目 錄

漢代察舉科目“有道”考釋	胡秋銀(1)
衛將軍“復興”——漢魏制度變遷的一則案例	羅 凱(23)
長沙走馬樓吳簡中所見“帥”的探討	戴衛紅(33)
語境、參談意念與魏晉玄學之屬性	嚴耀中(59)
《宋書·宣貴妃傳》流傳及佚文考——兼考今本《宋書·劉子鸞傳》的 錯頁	赫兆豐(70)
中古史籍與道經中所見“六夷”與“中國”	姜望來(83)
蕭梁前期的晚渡北人——新刊梁《普通二年墓誌》小考	陸 帥(98)
南朝官職除拜考述——以制度程序及過程為中心	周文俊(116)
北魏長川與牛川位置考	趙 傑(139)
中古源氏的郡望變遷與身份認同	郭 碩(147)
略論隋唐之際江淮黃淮間文人群體——以《文選》的傳播為例	朱 海(168)
五代都城設置與府縣等級升降考	齊子通(185)
吐蕃時期沙州永壽寺研究二三題	楊 銘(197)
浙江圖書館藏清抄本《唐會要》述略	曹海花 劉安志(213)
《唐刺史考全編》拾誤	曾 澗(221)
葛洪著作中的山與早期道家	馬思勸 著 姜虎愚 譯(249)
本輯作者工作和學習單位	(274)
稿約	(275)

Contents

A Textual Research and Paraphrase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commendation	
Item "Youdao" in the Han Dynasty	Hu Qiuyin(1)
General of Martial Might's "Renaissance": A Case of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Between Han and Wei Dynasties	Luo Kai(23)
Study on the "Shuai" in the Sun Wu's Bamboo Slips of Changsha	Dai Weihong(33)
Context, Intentions in Conver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etaphysics	
in the Wei-Jin Period	Yan Yaozhong(59)
The Transmission and Lost Articles of <i>the Biography of Xuan Guifei in</i>	
<i>Songshu</i> :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Disarranged Page in <i>the Biography of</i>	
<i>Liu Ziluan in Songshu</i>	He Zhaofeng(70)
"Liuyi" and "China" in Medieval History Books and Taoist Scriptures	
.....	Jiang Wanglai(83)
The Late-arriving Northerners in Early Southern Liang Dynasty: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Newly-published Epitaph of the Second Year of Putong	
Period	Lu Shuai(98)
Research on the Official Appointment about Chu and Bai in Southern Dynasties,	
Focused on the Systematic Procedure and Process	Zhou Wenjun(116)
The Research for the Position of Changchuan and Niuchuan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Zhao Jie(139)
The Transition of Yuans' Noble Commandery in Mediaeval China	Guo Shuo(147)
On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Jianghuai and Huanghuai Region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Periods — A Case Study of the Circulation of <i>Wenxuan</i>	Zhu Hai(168)
The Establishment of Capital and the Grade Change of Fu, County in the	
Five Dynasties	Qi Zitong(185)
Notes on the Studies of Yongshou Temple at Sha-zhou in its Tibetan	
Period	Yang Ming(197)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i>Tanghuiyao</i> Transcribed by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Zhejiang Library	Cao Haihua, Liu Anzhi(213)
The Errors Correction for <i>Complete Works of Study on Prefectural Governors</i>	
<i>in Tang Dynasty</i>	Zeng Jian(221)
Mountains and Early Daoism in the Writings of Ge Hong	
.....	Thomas Michael (Translated by Jiang Huyu) (249)
List of Contributors	(274)
Note from the Editor	(275)

西漢孔安國釋：“有道，謂有道德者。”^①則只強調其道德意味，顯然只注意到有道者的道德修養水平，而忽視了孔子語境下有道者的高尚人格層次。

作為察舉科目的“有道”則完全脫離儒家道德人格的因素。翻檢史籍，不難發現，東漢朝廷在發生日食、旱災、雨澇等災異時，常要求中央或地方官員舉“有道”“修道”“有道術”之士，語詞有時連及“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璿璣之數”，顯然這類被舉者是作為精通術數方技、被期待能憑借這類知識和技能來應對災異的人才被推薦的。

天象與人事相感應，災異與政治相聯繫，本是先秦時期即有的思路。西漢中期大儒董仲舒系統推陰陽以明災異，建構災異譴告說和天人感應神學體系，進一步發展此種觀點。伴隨着儒家思想被確立為官方思想，以經治國成為統治理念，通經入仕成為利祿之途，經由官、私儒學教育，董仲舒的觀點成為常識。通過舉薦才德之士來改善政治，加強教化，是先秦以來人才選拔的慣常舉措。選拔才德之士以消除天災，或許是漢元帝時今文經學大師京房的發展。《續漢書·五行志三》“(安帝永初)五年夏，九州蝗”條劉昭注引《京房占》曰：

天生萬物百穀，以給民用。天地之性人為貴。今蝗蟲四起，此為國多邪人，朝無忠臣，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侯試明經，此消災也。

“舉有道”與“試明經”對舉，被列為消災二方。結合語境分析，京房所謂“有道”當指得道之人。“舉有道”以消災，始見於此。而何以有道能消災呢？《漢書》卷三〇《藝文志》載：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

儒家、陰陽家、天文者均有助於施政。有道就是精通陰陽、天文等知識和技能的儒者。

^①（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一《學而》，《十三經注疏》，第2458頁。

“舉有道”作為消災之方，從理論落實到實踐，經歷了一段時間。與此同時，“有道”逐漸失去其得道之士的本義，而專指有道術之士。導致這種轉向發生的最關鍵環節，是經學讖緯化的發展和統治者對讖緯的崇信。誠如《後漢書》卷八二上《方術列傳》序所云：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

漢武帝對於方術的喜好，對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解釋儒經的認可和宣導，促進了政治與神秘術數的結合。東漢光武帝因借助讖語籠絡人心，建立政權，即位後宣布圖讖於天下，推動了儒家經學讖緯化的發展和政治文化中非理性因素的強化。加之東漢儒學發展，無論官學還是私學，均以讖緯解經，由此培養出一批批精通術數的儒生。大臣上書，每每援引讖書來解釋天災，神秘文化與政治的結合，至此逐漸走向上升期。正是在這一形勢下，舉有道成為一項政治舉措。

《後漢書》卷八二上《方術·郭憲傳》載：

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郭）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盃。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篤信讖緯的光武帝即位後在全國訪求有道之人。這是“有道”作為察舉徵辟項目的開端。郭憲作為“有道之人”被徵，拜博士。建武七年（31），郭憲已晉升為光祿勳。從郭憲在南郊的舉動來看，他是通方術的技能之士。《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三》著錄有郭氏撰《漢武洞冥記》一卷。^①《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異聞之屬”收錄《漢武洞冥記》四卷。四庫館臣以為：“考范史……（郭憲）蓋亦剛正忠直之士。范史徒以世傳嚙酒救火

^①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載“《漢別國洞冥記》四卷”，《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三》載“《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四卷”，均記為郭憲撰。

一事，遂抑居《方術》之中。其事與樂巴相同，或有或無，已不可定。^①至於此書所載，尤皆俶詭之談，似未必真出憲手。又詞采縝豔，亦迥異東京。或六朝文士依託爲之歟？”^②考其內容，無論郭憲是《洞冥記》真實的作者還是僞託的作者，均源於他作爲“有道之人”的學識和技能背景。

光武帝首創徵求有道之士的政治舉措，被沿襲下來，通常在出現天災、動亂或異常的自然現象時，朝廷要求官員舉有道，而被薦舉者研習讖緯化經學，精通術數，是其共性。

章帝時被舉有道者有趙曄、張匡。

《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趙曄傳》載：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斯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撫]卒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同卷《杜撫傳》載：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

東平王劉蒼是光武帝劉秀之子，明帝即位，劉蒼爲驃騎將軍，永平五年(62)還國。杜撫卒於建初(76—84)中，約在公元80年左右。趙曄在杜撫去世後歸鄉，他被舉有道當在漢章帝時。與趙曄同時期的張匡被舉有道時間可能差不多。張匡“舉有道，博士徵”，應該是兩回事，他都沒有響應。

① 關於樂巴的事跡，見於《後漢書》卷五七《樂巴傳》：“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奸誣。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樂巴精通道術，憑借技能剷除地方淫祀之風。

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五十二《小說家類三·漢武洞冥記四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874頁。

趙曄、張匡均通《韓詩》。韓詩屬今文經學派，其開創者韓嬰與董仲舒同時而稍早，精熟《詩經》和《周易》。“武帝時，（韓）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①韓嬰與董仲舒觀點不同，但韓詩的流傳不能不受時代影響，而逐漸識緯化。趙曄的老師杜撫和張匡所撰《韓詩章句》，應是此種學術趨勢下的作品。

和帝時被舉有道者有樊英、王輔、杜繁賓。

《後漢書》卷八二上《方術·樊英傳》載：

（樊英）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暹、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

由上推知，樊英被舉有道是在和帝時。樊英的知識背景相當駁雜，通《京氏易》，兼明五經，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這是他被舉有道的堅實基礎。

《後漢書》卷八二上《方術·樊英傳》注引《謝承書》：

（王）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援神契》。常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王輔可能在和帝時被舉有道，對策而拜郎中。若將此條材料與《後漢書》卷五七《謝弼傳》合看，則被舉有道者接受朝廷對策，拜郎中，似是普遍現象。王輔精通《公羊傳》和《孝經援神契》。《公羊傳》屬今文經學，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說解釋《公羊傳》，使其與政治緊密結合。《援神契》是緯書之一。王輔因“陳災異，甄吉凶有驗”，升任議郎，則其以學識和技能服務於朝廷，得到肯定。

據《新唐書》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出身於京兆杜氏家族的西晉杜預的高祖杜繁賓曾被舉有道，未就。

① 《漢書》卷八八《儒林·韓嬰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613頁。

(杜)繁賓字叔達,舉有道,不就。二子翕、崇。崇字伯括,司空掾。生畿,畿爲伯侯、魏河東太守、豐樂戴侯。三子恕、理、寬。恕字伯務,弘農太守、幽州刺史。生預,字元凱,晉荊州刺史、征南大將軍、當陽侯。

《魏書》卷一六《杜畿傳》載杜畿“少孤”,說明其父杜崇早亡。據《後漢書》卷四《和帝紀》載:

(永元六年)南單于安國從弟子逢侯率叛胡亡出塞。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使匈奴中郎將杜崇討之。

參同書卷八九《南匈奴列傳》:

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

同書卷四《和帝紀》載:

(永元)七年春正月,行車騎將軍鄧鴻、度遼將軍朱徽、中郎將杜崇皆下獄死。^①

杜崇因與單于安國相處不和,故意令西河太守阻攔單于上章,導致漢軍與南匈奴的戰爭失敗,於永元六年(94)十二月抵罪,次年春被處死。根據杜崇活動的年代,推測杜崇父親杜繁賓被舉有道的時間在章帝、和帝時。

安帝時曾數次下詔要求薦舉有道。《後漢書》卷五《安帝紀》載:

(永初元年)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① 《續漢書·天文志中》載:“(永元六年)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迹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徽、護烏桓校尉任尚、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徽、中郎將崇皆抵罪。”

永初元年(107)三月,因發生日食,朝廷下詔命令推薦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等特殊人才。

同篇又載:

(永初)二年……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秋,七月戊辰,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并見,萬民饑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誠。”

文中提到公、卿、郡國所舉賢良、方正對策浮虛尋常,其中賢良、方正當即公、卿、郡國因應去年三月詔書而推薦的人才,但顯然皇帝對他們的對策不滿。針對天災、人禍,朝廷再次下詔博求幽隱,廣開言路,要求“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明確希冀有道術、精通陰陽術數者提出有效對策。

關於永初二年(108)七月詔令的實行情況,《後漢書》卷四六《陳寵傳附子忠傳》的相關記載為我們提供了具體的情節:

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陳)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遊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忠獨以為憂,上疏曰:“……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誠。”

由此可知,安帝時因災異頻現,曾舉有道。安帝採納陳忠的建議,對有道之士策問國事。對問高者,特遷一等。沛國施延即因策問高第而拜為侍中。

永初五年(111),針對天災和內亂外擾,安帝下詔求賢才,其中要求中央和地方官

員各舉有道術之士一人：

(永初五年閏月)戊戌,詔曰:“朕以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能興和降善,為人祈福。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以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後漢書》卷三九《周磐傳》載：

(周)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遂不應。

周磐精熟經文,曾應舉孝廉,擔任地方官。他因思念母親而還鄉授徒,後以親沒、無意仕途而不應有道之徵,卒於建光元年(121)。他被舉有道,可能是在永初年間。

建光元年(121),安帝明令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建光元年夏四月)己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本次薦舉無特殊自然或政治背景。關於此次薦舉,前揭《後漢書》卷八二上《樊英傳》的相關記載值得注意：

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樊)英及同郡孔喬、李暹、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

史書雖未明言以上諸人是應有道之舉而被徵,但結合《安帝紀》的敘事,時間和事件似

可對應。前引本條李賢注引《謝承書》載王輔“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①當指此次舉有道事。則此次應舉者有郎宗和楊倫。《後漢書》卷三〇下《郎顗傳》有關於郎顗父親郎宗的記載：

父(郎)宗……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郎宗應徵有道，在對策時表現優秀，拜吳令。他精通風角，在任上預知京師大火，被徵爲博士，而他“恥以占驗見知”，逃官遁隱。

《後漢書》卷七九上《儒林上·孔僖傳附孔季彥傳》載：

延光元年，河間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孔)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

延光元年(122)，安帝因河間大雨雹而詔見有道術之士。孔季彥根據陰陽關係，指出河間大雨雹源於“貴臣擅權，母后黨盛”，以致安帝沉默不語，其左右對他很不滿。孔季彥作爲“有道術之士”，何時被舉有道，無從得知。但安帝在位期間屢次召見有道之士諮詢時政，顯然可知。

據《後漢書》卷八二上《方術·李南傳》載，李南“明風角”。在和帝永元年間，丹陽太守馬陵坐盜賊事被徵往廷尉，李南預言他將於第二天中午被釋放。他“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李南之被舉有道，可能在安帝時。

順帝時被舉有道者有如下人物。

據《後漢書》卷三〇上《楊厚傳》載：

(楊厚)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

^① 《後漢書》卷八二《方術上·樊英傳》注引《謝承書》，第2723頁。

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宜蠲漢改憲之道，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大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爲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

廣漢楊氏自楊厚之祖父以來三代均善圖讖學。按照敘述順序，楊厚被舉有道是順帝永建二年(127)之前的事。永建二年，順帝特徵問事，後拜議郎，三遷爲侍中。根據其上書內容及受到順帝褒獎後的待遇，頗疑楊厚是以有道之士被徵。

類似的情形見於《後漢書》卷三〇下《郎顗傳》的記載：

(郎)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曰：“……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采異謀，開不諱之路……”

臺詁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

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後復公車徵，不行。

在順帝陽嘉二年(133)前，郎顗曾被舉有道。陽嘉二年，他應公車徵，上章建議更始，“徵有道”成爲其對策建言之一。郎顗很可能即是有道術而被公車徵。值得注意的是，郎顗詣闕拜章之後，順帝命他接受尚書臺對策。尚書臺針對其上章，提出質疑。之後他被拜郎中。上章後接受尚書臺對策，這是其他有道之士未曾經歷過的，至少史書未載。對策之後拜郎中，與之前王輔拜郎中、施延特遷侍中、楊厚拜議郎相似，似乎可以說明以有道應舉或應徵者都會接受對策，對策後拜以朝官，後來可能外調如郎顗父親出任吳令。

《後漢書》卷三六《張霸傳》載：

後徵，四遷爲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鸞，當朝貴盛，聞(張)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疾卒，年七十。

清代惠棟《後漢書補注》卷一〇引《華陽國志》云：

（張）霸在郡十年，以有道徵，拜侍郎，遷侍中也。^①

本傳載他曾“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②并刪定樊氏書為《張氏學》。張霸可能在順帝時期被舉有道。

《後漢書》卷六《沖帝紀》載：

（建康元年〔144〕九月）庚戌，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

此次薦舉當是針對同月丙午那天“京師及太原、雁門地震，三郡水湧土裂”的地震災害而實施的舉措，“幽逸修道之士”可能是指有道之士。

桓帝時被舉有道者有宗慈、劉寬、趙咨、尹勳、徐穉、趙典、向栩、申屠蟠、郭太、董扶、庾乘等。

《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宗慈傳》載：

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宗）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

參同卷《岑晊傳》：

（岑）晊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見。晊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

① （清）惠棟：《後漢書補注》卷一〇，《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270冊，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九年馮集梧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1頁。

② 《後漢書》卷三六《張霸傳》，第1241頁。